



佐临与上海抗战戏剧

柯 灵

佐临走后，一转眼过了半年多。我参加了他的告别会、追思会，但一直有个感觉，似乎他没有走，还留在这闹喧喧的人世间。他的音容笑貌，活生生地在我眼前。我和佐临相识，已经半个多世纪。在上海沦陷时期，我跟他学着搞戏剧运动，天天在一起，后来经过几番天摇地动的世变，不在一起工作了，也没断过来往。伟大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上海摆弄文学艺术的，都按照军队编制，编成许多连队，集中在奉贤塘外，一大片靠海的盐碱地上，实行肉体 and 灵魂的彻底改造。牛鬼蛇神，群居终日，再熟的朋友，见面如不相识，有的还互相倾轧，表示勇于脱胎换骨。我受无产阶级专政三年，刚从牢里出来，更有一种人见人怕的特异功能。我和佐临不在一个连队，彼此近在咫尺，恍若天涯，有一次忽然在浴室门前狭路相逢，他闭起一只眼，向我扮了个鬼脸，神情滑稽而天真，完全像个顽童。整整十年，我们仅此惊鸿一瞥，但这样也就足够了。“文革”效应造成无数灵魂爆炸、人际关系破裂的事件；“文革”以后，我和佐临却外甥打灯笼——一切照旧。并非我们顽固不化，不惜冒险搞曾经很受忌讳的所谓串连，或者着眼于一般的所谓联络感情。见了面，并不正二八经，抵掌谈艺，或者正襟危坐，纵论天

下大势，也不飞短流长，言不及义；只是随心所欲，纵意而谈，融融泄泄，无拘无束，感到很愉快，似乎人生在世，应当有此一境。这种聚会，一年也不过二、三、四次，有时在我家，有时在佐临家，桑弧也常参加。偶或打个电话，旨在通候，别无深意。年岁不饶人，“文革”又把人革老了，佐临出行，先是骑自行车，后来改用机动三轮车，近一两年，只好安步以当车了。我和佐临的寓所，有相当一段距离，他还坚持要来，分手时总是我送他一段路，由他钟爱的小外孙女半路把他接回去。他最后一次因病住院，我只去探望一次，后来病重，医生禁止探病了。佐临不是那种洒脱不羁的野马性格，但很风趣。他的成就和声誉不可谓不大，前几年得到一种什么荣誉，他就戏说是“范进中举”。去年上海宝山钢铁厂办高雅艺术奖，给不少艺术界的老人发了荣誉奖，佐临、桑弧和我都蒙此幸运，佐临就提议，等他能起床了，三人合影，留个纪念。这个愿望终于没有完成。世事如云，人情多变，朋友缔交，忧乐相通，始终不渝，荣辱与共，越来越显得难能可贵，欧阳修曾经咏叹“古来交道愧难终”，近代学人陈寅恪也有诗吟“暮年相见非容易”，佐临走了，他留给我的记忆，大概将伴我终身，直至我把它带到天上。

佐临丹尼，伉俪情深。丹尼是名演员，学有专攻，夫妻并肩携手，干了一辈子戏。“文革”终场不久，上海市政协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参观访问活动，登井冈，上庐山，遍历湘赣革命根据地，参加的多是受过严重冲击的各界知名人士，丹尼和我也蒙宠邀。一路昼行夜宿，旅程中发现，丹尼经常错认车辆和宾馆住房号码，当时不以为意，看成是艺术家的脱略，其实是老年痴呆症的阴影开始向她追逐。这不幸的病给这劫后的幸福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不幸，对佐临更是沉重的一击。开始时朋友充满同情，关切丹尼的病情，日久感情麻木，世界很快忘记了这位才华卓越的表演艺术家。佐临富有涵养，能平静地经受各种打磨，《戏剧大师佐临》纪念集里，有一张佐临丹尼的暮年双影，白首相依，神态安详，笑容可掬，其实丹尼那时已经浑不知春秋日月，看了令人心酸。据说佐临谢世，儿女试把这噩耗告诉长年卧床的丹尼，她似有所动，说：“嗟，真是的！”这谜样的短句就当了她的悼词。生离死别，这种悲痛太深重了，我想丹尼不知道倒好。现在相隔整整七个月，丹尼也终于去了。她去的日子也挑得好，是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，很容易记。丹尼的告别会，我也去送了行。佐临在他的告别会上，全身洒满了嫣红的康乃馨；围绕在丹尼身边的，是一色金黄的菊花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花丛中安息。蜀芹姐妹和弟弟，一字儿并肩侍立，一个个泪流满面。从殡仪馆出来，我不由得想，生老病死，是生活常规，谁也逃不过，像丹尼这样，不如说是真正的大解脱。蜀芹现在已卓然大家，接过了佐临的接力棒，弟妹也各有所成，老两口也该放心了。天上大概不会有政治动乱，也不会有令人无可奈何的老年痴呆症，佐临丹尼早日在天上团

圆，该为他们高兴才是。

对佐临对戏剧艺术的贡献，信口雌黄，未免多事，因为事实俱在。抗战时期，佐临丹尼从英国赶回祖国，在荆棘载途的上海，先后主持上海职业剧团和苦干剧团，我都参与了。“上职”开张于1941年10月10日（这是旧中国的国庆节），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；“苦干”揭幕于1943年，也是双十节，日寇的铁骑已踏遍十里洋场，境遇之险恶，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。剧团开幕伊始，都有一篇开场白，一如江湖卖艺人向看客抱拳拱手打招呼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……”实际上是对敌仍含蓄而又公开的政治表态。宣言系佐临主持，经过讨论，由我形成文字，现在早已成明日黄花，却也是一种历史的旧物了。我两次进日本宪兵队，就在“苦干”时期，佐临不顾自己的危险，为我奔走营救，受刑释放后，又陪着我问医求诊，后来我们还曾经一起逃难。他尽心尽力，始终神态雍容，默无一言，我也从未口头向他表示感谢，我觉得像佐临这样的朋友，莫逆于心，更为合适。他走了，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想借笔墨表一表我的哀思，但我现在还没有这种余裕。我花了不少力气，还麻烦朋友，把这两篇近于湮灭的开场白找了出来，算是天上人间，共话当年，希望佐临丹尼读了，回首前尘，赧然一笑。

1995.1.15.

附录一：《试步》

（上海职业剧团开幕词）

我们——一群偶然汇合的戏剧工作者，从今天开始了行程的第一步。

我们是素朴的，恰如一切先行的伙伴，有美丽的憧憬，也有庄严的自觉。舞台是我们的天地，演剧是我们的人生。

对于戏剧艺术，我们有事业的赤忱，宗教式的虔信，于成功少所期许，对责任绝不自馁。

我们生活于现实，生活于广大的观众，有如鱼生活在水里。

在孤岛剧运的源流中，上海职业剧团是一道涓涓的分支。它来自主流，也将追随主流，复归于浩瀚的海洋。

当这试步的起点，让我们以跃动的心，伸出热烈的手——期待同情与提挈的手。

附录二：《献辞》

（苦干剧团开幕词）

“苦干”这名词的诞生已经有相当时期了，可是正式成为团体跟社会对面这还是第一天。我们愿意借这机会，站在幕前，把我们虔诚的心情呈献于观众诸君。

两年来的话剧界正走着一条曲折多变的路，从单纯到复杂，从平坦到险峻，从素朴的业余姿态到争奇斗艳的职业演出——这情形不免使关心者目眩心悸，然而我们试从一个较远的角度，居高临下，把环绕戏剧圈子的时空关系连系起来看看，就可以明白这也许正是一种必有的现象。话剧界有它优秀的传统，光荣的奋斗历程，站在这可贵的历史的基石上，我们不难望见它辽阔无边的远景。

苦闷和动荡是这时代的特征，戏剧工作者自然不能例外。我们是藐小的一群，整个剧运中的一个小小环节，正如一切先进和同行的伙伴一样，我们对戏剧有的是献身的热情，这热情足以

培育理想，增强自信：我们确自己工作的庄严。同时心折一位先贤的警句：“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。”只要有所皈依，努力决不会白费。

我们这一次长期义演，却还别有一点小小的意思——

第一，战乱中青年失学问题的严重尽人皆知，如何尽可能挽救正是当前的急务，我们愿意在舞台之上，直接对社会贡献一点心力，这以后半年演剧所得，除最低限度的开支外，将全部捐充《申报》助学金。

第二，按照现状推断，话剧职业化可说是一个必然的归趋，“上剧”那样半业余性的时代已经逐渐远去了。但在组织上，这一次我们却想以业余团体的优点，试用于职业演出：我们没有老板——我们的老板就是观众，也就是每一个助学金的捐款人；我们没有主人——我们的主人就是“苦干”的全体团员，从剧团行政到演出事宜，都由自己主持，不受任何方面或个人的牵掣。

第三，因为这是义演，所以只许盈余，不许亏蚀：我们支最低的薪给，尽最大的努力，这也许多少能磨练一点戏剧工作者的苦干精神。

这只是一个尝试的开端，未来有多少成就却不能预期，但我们愿意把目标先挂起来，不论将来能走多远，我们反正是向这目标行进着。

戏剧工作者的生命在舞台，舞台上的活动是我们最真诚的自白。现在我们把幕布揭起来了——我们期待的是前辈的指导，同行者的扶持，特别是观众，热心助学运动的社会人士的支援。

（上接16页）

这样一来，我和黄照先就被派到联政所创办的部队报纸《部队生活》社当特派记者：黄照到骑兵旅，我原本要去独立一旅的，临行又被留下做编辑，教员的技术津贴自然没有了，营级干部的政治待遇不变。记得离开桥儿沟要到联政宣传部报到的那天，黄海（吴微）说了一句：

“今天正是三月十八啊。”

论年份是1943年；正当延安整风后期的审干阶段，康生操纵的中央社会部发动一场灾难性的“抢救运动”前夜的岁月。

转眼，几十年的风尘岁月过去了。原先部艺学校的旧班底，建国后，发展成为武汉中南部队艺术学院，后来终于变成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。

1994年5月31日